国之宝桢

青史意绪

刘绪义

作家

家风长不长，廉字第一防。

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33岁的丁宝桢考取进士，先后任岳州、长沙知府，48岁任山东巡抚，57岁升任四川总督。“平远奇男抚东督，川勇于任事惩恶扬善一身正气，晚清重臣爱国为民睿智超群廉洁奉公两袖清风”，这副对联概括了丁宝桢一生的功绩，也是他德政双馨的人格写照。

丁宝桢并非出身名门望族，但丁氏家族却长盛不衰，传至丁宝桢已历百年。乾隆初年，丁宝桢先祖丁福汉，经商来到贵州平远州牛场镇，见这里山清水秀、民风淳朴，就定居下来。丁福汉虽是生意人，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。丁福汉之子丁公俊深受影响，赋诗以言志：

“人非圣贤无高下，世代忠良不可差。读书耕田不误时，精忠报国品自嘉。廉洁奉公身高洁，尊老爱幼在天涯。一旦蒙恩受命时，不负朝廷不负家！”

诗中阐述了人无高下，品有忠否；平日读书耕田，常思精忠报国；一旦出仕为官，必须不负家国。其核心在于一个廉字，立身高洁看廉品，走遍天涯爱当先。

正是这首被丁氏后人看作家规的诗，培育了丁氏百年不衰的良好家风；正是这首传之百年的家规诗，造就了丁宝桢的高尚人格。

丁公俊之子丁必荣，37岁做官，先后任四川酉阳州州判和昭化县知县，廉洁敬业。丁必荣之子丁世棻，27岁成为优贡，在贵州镇远府训导职位上，十年如一日，克勤克俭，兢兢业业。

丁宝桢是丁世棻之子，深受先辈家风涵养熏陶，无论在哪个地方为官，都留下了不朽的名声。

他在山东为官13年，先后任山东按察使、布政使，直至山东巡抚。在此期间，他做了三件名传一时的大事。一是智斩太监安德海；二是督治黄河水患；三是创办山东机器制造局。丁宝桢也被称为晚清山东最有为的官员。

在济南崇孝苑碑林里的一块石碑上，记载着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黄河在山东郓城决堤，丁宝桢带病治理黄河水患的事迹。在山东菏泽黄河边的障东堤石碑上，则记载了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黄河决口，正告假在贵州的丁宝桢赶回山东督治水患的情况。这些石碑承载了百姓对丁宝桢这位好官的深深怀念。

在丁宝桢为官十年的四川，同样留下了他良好的口碑。在这里，丁宝桢同样干了三件大事：一是改进都江堰水利设施；二是创办四川机器局；三是改良盐法。为此，朝廷特为丁宝桢写了一幅字，上书四个大字：“国之宝桢。”而丁宝桢的雕像至今仍然矗立在都江堰边上。

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丁宝桢逝世于四川总督任所。由于平时的俸金多数用于济困助学，作为一个封疆大吏，他在病危时竟然债台高筑，只好上奏朝廷：“所借之银，今生难以奉还，有待来生含环以报。”光绪为之动容，称“遽闻溘逝，悼惜殊深”。礼部尚书李瑞芬更是感于其功德胆识情操，把他与曾国藩、左宗棠等同推为晚清名臣之一。噩耗传出，山东父老悲恸、惋惜、哀叹，请求朝廷将丁宝桢的灵柩运回山东。灵柩运至济南，士绅百姓争相“郊野祭吊”。将其遗体葬于历城（今济南）华不注山麓。山东百姓对这样一个外乡人表达了何等的挚爱与尊敬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贤人去矣，家风绵长。丁宝桢长子丁体常，官至广东布政使；次子丁体勤，任山海关通判。其孙丁道津，曾任刑部主事，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以道员衔在济南创设官商合办的山东泺源造纸有限公司，担任公司总经理，民国元年一度出任山东布政使。侄孙丁道衡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教育家。丁宝桢的家教家风在留给儿子的信中便可知一二：

第一，志在君民，不依阿从俗。他在给儿子丁体常的信中说：“遵率祖父家规，我之做官，志在君民，他无所问。宁可被参而罢黜，断不依阿以从俗，而自坏身心，贻羞后世也！”

联想他在山东、四川为官时采取革除陋规、清查账目等一系列扭转官风的举措，他立下为官以君民为重的家规，更让人钦佩。

第二，做人做官，要立定脚跟。丁宝桢告诫儿子：“至做官一事，原是讲求做事，其补署一切，应听之天命。万不可有心其间，一涉有心，即易入于钻营，将顺卑鄙一路，切毋以此为念。立定脚跟，做人做事，方是大丈夫所为。”

做大丈夫，不做钻营之小人，是丁宝桢自己的写照，也是对子孙的告诫。

第三，存心忠厚，多济苦救民。与对自己要求节俭一样，丁宝桢要求子孙家用不要和别人攀比，“家用务宜节省，肥浓易于致病，不如清淡之养人。华服适滋暴殄，不如布衣之适体。”同时还要存忠厚之心，多济苦救民，“事事悉存忠厚之心，不敢侮人，不敢慢人，遇有善事量力乐做，不可妄取民间一钱，如供余之内，稍有赢余，即以之救济穷苦贫民。”

古语说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说的便是为长者一生坚守的价值追求，也就是其家风中最为鲜明的价值观，不仅融入后人的血脉，而且成为激励世人的强大精神力量，流芳泽世，砥砺人心。丁宝桢是这样，其他名人先贤也无不如此。

史海逸趣

无言之辩

□马军

“辩”是必须用“口”的，无“言”焉能成“辩”？对于“口”之功能，人们认识尤为深透。精于辞令者自不必说了，即便拙嘴笨舌呆若木鸡之辈，在屡屡吃亏之后也会咬牙立志铁杵成针。讼场上，竞辩中，伶牙俐齿，以不世之“口”功，证我之大“是”、他人之大“非”，而种种“利好”也就尽在其中了。

古人似乎对此慢了半拍，老子就曾经这样说：“大辩若讷。”要半天甩不出一句完整话来，这才是论说的最高境界。宋太祖赵匡胤对此就有独到的见解。当年江南名士徐铉奉南唐国主之命前来进贡。这个徐铉先生，不只学问好得不得了，更兼辩才极佳，即使苏秦、张仪再世，也未必能敌。让谁去接待徐铉呢？稍不留神就会给大宋朝廷丢了面子。宋朝宰相一时间大为踌躇。谁知，宋太祖已把人选拟好。原来，负责接待徐铉的，既不是善说的陶谷，也不是儒雅的窦仪，而是一个其貌不扬、文化不高又兼口吃的宫廷侍者。结果，一路下来，任凭徐铉口若悬河，却如同对牛弹琴。徐铉激情了半天，这边只是一个音节：“哦！哦！哦！”再后来，徐铉一个字也没有了。

相较于这个宫廷侍者，范镇和司马光更绝，他们连“哦”字都懒得说，每当见解不一致时，就用下棋、投壶来决定谁胜谁负。

不是说“理越辩越明”吗？为何现实中如此多的人不屑于言语呢？其实，辩来辩去，往往都是虚幻。真理有它自己的属性，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绝不会因为你说得天花乱坠就改变一丝一毫。宋朝君臣之所以不屑于逞“辩”之能，并非真的不能“辩”，而是他们已然廓清迷雾，成竹在胸，自信“时间”会作出最为公正权威的裁判，事实自会水落石出。

徐铉代表着南唐小朝廷，虽巧舌如簧，但不久即做了北宋的阶下囚，而南唐也被北宋所灭；不急于辩高下、论输赢的范镇、司马光二人，其不朽功业和历史地位如星斗高悬。何其如此？因为他们一味精进、专务躬行，无暇他“辩”，亦无兴他“辩”，遂以“默”做辩、以“做”做辩，终以不辩而胜辩。无言之辩是为至辩！

古人论交友

读史阅世

彭如武

纪检干部

在中国古典文学中，包含了丰富的择友、处友哲理。高山流水、管宁割席，一个个经典的故事带着历史的沉思、深刻的劝诫、高洁的操守，给后人交友处世指明了方向。

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曰：“嘤其鸣矣，求其友声。”用山林中孤鸟鸣叫来寻求同伴的例子，说明朋友相处的重要性。孔子告诫弟子：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。”意指同正直、诚实守信、见闻博广的人交朋友，久而久之，自己也会近朱者赤；相反，亲近奸佞小人，就会近墨者黑，深受其害。清末重臣曾国藩，更在家书中谈到交友的作用：“盖求友以匡己之不逮，此大益也。”指出求朋友用以匡正自己的不足，是大有益处的。

关于如何交友，古人自有其道。孔子认为，择友首先考察他的人品，了解他的经历，分析他和你结交的目的。孟子认为，交朋友应该“友其德也，不可以有挟也”。庄子则认为“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”，君子之交坦坦荡荡却心心相印，小人之交则是以利益为基础。明代苏浚在《鸡鸣偶记》中把朋友分成四类，告诫世人要交那些能够互相砥砺品行、直言规劝过失的“畏友”和以心相交、生死与共的“密友”，而不要交巧言令色、只讲吃喝玩乐的“昵友”和只可同甘、危难时却落井下石的“贼友”。

由此看来，古人交友非常谨慎，因为朋友是进益和互助的。朱熹在家训中指出：“有德者，年虽下于我，我必尊之；不肖者，年虽高于我，我必远之。”告诫子孙，有道德品格好的人，即使比我年龄小，我也一定会尊重他；品格不好的人，即使比我年长，我也一定会远离他。曾国藩云：“一生之成败，皆关乎朋友之贤否，不可不慎也。”朋友是否贤明，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成败。

晋代傅玄在《太子少傅箴》中说：“故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”“朱”和“墨”固然可以理解为环境，但也可以理解为益友和损友，相信每个人都不希望去结交“墨者”而变黑。朋友有诤友、媚友之分，结交了诤友、益友就会让我们每天都有进步，结交了媚友、损友就会让我们每天受到伤害。“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；与恶人居，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。”前半句从正面道出了择益友而交的道理，后半句则以鲍鱼的腥臭味为喻，揭露了与品行不端的人为友，自然也会沾染上一些坏习气。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中有过这样的评注：“友所以辅仁，不如己，则无益而有损。”我们也就可以这样理解，所结交的朋友如果没有“仁”，没有“善”，没有“德”，这样的朋友会有妨害，是不能去结交的。《警世通言》提出“内有君子，门外君子至”，意指只要你本身正直，自然就会吸引同样正直的人。

古人关于择友、处友的言论很多，思想内容极为丰富。它是中华民族在悠远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一种生存方式和表达形式，体现了交友相益、志同道合、择善而从、不善而弃、友贵责善等交友之道，其中也蕴藏着为官处世之道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手握国家公权，代表党和政府形象，交友事关用权是否公正、从政能否廉洁，因此应慎之又慎。这就要求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多同普通群众交朋友，多同基层干部交朋友，多同先进模范交朋友，多同专家学者交朋友。哪些人该交，哪些人不该交，心中应有杆秤。

“洗马”者，非洗马之人也

说文解史

向敬之

作家

前不久，在一篇随笔中，谈及晚清重臣张之洞于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，转司经局洗马。没想到，有人留言，指出大错特错，反问这样一位探花出身的大官怎会被安排去司经局洗马呢？

人才难得，却被大材小用。

一石落水，没有惊起千重浪，却引来了不少围观者。

有人说，不是洗马而是冼马。有人说，孙悟空做了弼马温，太子有了洗马官……我只好在下面标注拼音“洗（xiǎn，音冼）马，即太子洗马”，表明我重视读者意见。不料，有人因为“太子洗马”连在一起，说太子亲自洗马，那么马夫去了哪儿？

一字之争，使一小文升温。

“洗马”一词，最早出自《国语》：“勾践为夫差先马，先或作洗也。”春秋吴越争霸，越国战败，国君勾践被俘，被胜利的吴王夫差欺辱做奴役。当时勾践夫妇老老实实给吴王夫差做了几年任由驱使的马夫。

韩非倒是为越王勾践说得隐晦些：“勾践入宦于吴，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。”意思是说，勾践来到吴国，身披铠甲，手拿兵器，为吴王夫差开路。韩非子让大英雄愿为前驱，省去了纯粹洗马的意思。后来，也因此就慢慢有了洗马一职。

正因为“洗”字前置，所以太子洗马成了一种玩笑。明代正统元年（1436年）会试第一的刘定之，由侍讲学士升任司经局洗马。一次，兵部侍郎王伟遇到刘定之，说：“太仆（为皇帝管理舆马畜牧的衙门）马多，麻烦洗马一一洗之。”刘定之笑着说：“何止太仆要洗，诸司马都不干净，我固然要洗。”刘定之的言外之意，是有“小司马”之称的兵部侍郎也不干净，需要“洗洗澡”。闻言者大笑。

某日退朝后，兵部尚书陈汝言遇到刘定之，开玩笑问：“刘大人，你的职责是洗马，一天洗几匹马？”刘定之应声答道：“厩马我都洗，唯独大司马洗不得。”大司马，兵部尚书别称也。陈汝言与在场的人笑得前仰后合。此事在明代王同轨《耳谈》、陆釴《病逸漫记》中都有记载。

玩笑归玩笑，史实归史实。洗马不是真去洗马的马夫，而是分管要务的文职。洗马，为中国古代特有官职，有为马洗澡的原始义。但千万别望文生义，认为那是一个孙悟空大呼上当的弼马温类的官职。

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说，太子太傅、少傅的属官有洗马之官。颜师古注引张晏说：“洗马原十六人，秩比谒者。”就是说，汉沿秦置，将洗马作为东宫属官，安排为太子的侍从官，有十六人的员额，职位和俸禄与皇帝近侍谒者相当，年薪六百石。到了晋朝，洗马减员为八人编制，改掌管图籍。南朝梁以洗马隶属典经局，管理公文信札，非士族大户不可任职。北齐称典经坊洗马，只设二人。隋唐于司经局置洗马，掌管书籍。唐高宗时期曾一度改为司经大夫，很快改回旧称。洗马隶属东宫，一直沿设至明末。清代司经局设洗马，用满汉各一人，从五品，但不属于太子属官，以备翰林官员升转。

中国古代有两个著名的李密，都同洗马有些关联。

魏晋之际名臣李密，以一篇情真意切的《陈情表》而闻名。李密是一个大学者，曾师事著名学者谯周，博览五经，尤精《春秋左传》。他初仕蜀汉为尚书郎，蜀汉灭亡后，晋武帝召其为太子洗马。李密以尽孝为由力辞。晋武帝为李密的一片孝心所感动，赞叹他“不空有名也”，于是同意他暂不赴诏，还嘉奖他孝敬长辈的诚心，赏赐奴婢二人，并指令所在郡县，发给他赡养祖母的费用。李密在祖母去世服孝期满后出仕，任温县县令、汉中太守，在任治绩卓著。

隋唐之际又出现了一个李密，义军首领，后归唐，同时为唐朝带去了一个能干的大才魏徵。武德四年（621年），太子李建成任命魏徵为太子洗马，倚为心腹，礼遇甚隆。李世民继位后，对魏徵的直爽非常赞赏，造就了贞观的一代名相。对于魏徵在太子洗马任上的作为，李世民说：“昔在东宫，尽心所事，当时诚亦可恶。我能拔擢用之，以至今日，足为无愧古人。”

品史悟道

大师们的读书观

□刘昌宇

鲁迅、胡适与钱穆，被称为民国时期知识界的柱梁，他们学贯中西，博闻强记，以高山仰止的成就，成了那个时代学界公认的大师。三位大师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成就，除了与他们的天资与后天的勤奋有关外，也与他们嗜书如命般地博览群书有很大关系。

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，他对中国现代文学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无人能企及的。他的读书观更是别具一格，大胆而又发人深省。鲁迅认为“（中国文学）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，文笔或者漂亮，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，甚至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，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，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，于是眼界便渐渐狭小，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。”因此提出要学习西方。鲁迅希望年轻人少走一些弯路，多吸收最先进的文化知识。关于怎样读书，鲁迅认为要多读书，但不能读死书，否则真成了“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”，并且“踏得一塌糊涂”了。

胡适对读书也有精辟的见解，他认为，读书是快乐的，因为“书中自有千钟粟”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。他认为读书有三重功效：第一，书本是学问知识经验之记录、人类之遗产，读书就是汲取这些智慧，来做基础，再去发挥而光大之。第二，读书能集思广益，让我们博学而多才。他举例说：“有许多书，我们读起来是不懂得。一定要读了许多别种书，才能读得懂这本书。”如此一来，书越读越多，思想和见解必然会越来越深刻，人们的才学也就日益广博了。第三，读书可以解决现实困难。他风趣地指出，我们怎样生活？怎样对付社会环境？这些都是人生极困难的问题。如果不读书，就不会有主意。多读书，主意自然会多，解决困难也就比较容易。

钱穆的读书观则让人耳目一新。他认为，第一，读书要“活”。钱穆多次说过，书的背后必该有人，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，决非善读书者。他还说，只有了解到每一书的作者，才懂得这一书中所蕴涵的一种活的精神。第二，读书要“多采其长，不当专指其短”。他说：“一书总有缺点，我们读一书，要了解此书精神所在。任何书不会都使人全满意。我们做学问读书，要能采其长，不是要索其瑕疵，来批评它的缺点。”第三，读书要“会通”。钱穆认为，要读全书，不可割裂破碎、只注意某一方面。第四，读书要读“原书”。钱穆多次对他的学生讲道：“要真读本书，不要追随时代，人云亦云。”

纵观这些大师们的读书观，虽然着眼点各有不同，但对于我们来说，不管做学问还是做人，无疑都极具启发意义，值得我们借鉴。

廉泉让水

□李兴濂

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山，有一处泉，它掩藏在醉翁亭前左侧的山溪壁角，泉水汩汩流出，泻入山溪。泉眼边赫然竖有清代康熙年间知州王赐魁立的一口“让泉”碑。凡来此地的游客，必观此景，多想喝上一口，然而一看见“让泉”二字，就会相互礼让，未曾听说有为争水而倾轧之事。因此，“让泉”又成为一道新的靓丽风景，虽说来此地的人大都是凡夫俗子，却有着君子的风度。

让泉的名字出于北宋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：“（琅琊）山行六七里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，让泉也。”“让泉”因为“泻出于两峰之间”，是两峰相让的结果，这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欧阳修深有感触，更使其获得因祸得福、因醒而乐的极大满足感。“让泉”实为欧阳修的心灵之泉，是他寄托自己政治和人格理想的重要载体。“酿泉为酒，泉香而酒洌。”所酿之泉就是让泉。泉水不可能有什么香气，但泉与人格精神相连就会有香气。“让”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观念，欧阳修能从“让”中获得精神上的支撑，以“让”和“醉”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处境，醉心山水而又心系百姓，独善其身而又心怀天下，醉中能醒，醉中寄托着高尚的人格与道德风范。“让泉”是以泉喻欧阳修之性，也是寄希望于政治生态清正廉洁，礼让成风。

南北朝宋明帝年间，一次梁州范柏年进京觐帝咨事。来到京城后，明帝与他闲谈时，戏问范：“广州有水名曰贪泉，据说那里出的贪官均与饮此水有关，此事你可听说没有？”明帝又一语双关地问道：“梁州是否有这种地名？”范答道：“圣上明察，梁州唯有廉泉、让水、文川、武乡。”明帝再问：“爱卿宅居何处？”范答：“卑臣寒舍居于廉、让之间。”范柏年巧妙对答无懈可击，既说明他任职之地民风淳朴、人性谦逊，又暗示自己为政清廉，不事权贵，受到梁州人民称赞。这就是“廉泉让水”典故的出处。此后，“廉泉让水”作为风尚朴实的褒词，常被人们用来赞美一方人才荟萃、节俭礼让成风。

在琅琊寺北侧，还有另一口古泉——“逊泉”。“逊”和“让”一样，都是儒家所强调的道德观念。孔子云：“奢则不孙（同“逊”），俭则固。与其不孙也，宁固。”“逊”之重要由此可见，其在精神上与“让”是相通的。

泉尚知让，况人乎？自古以来，文明礼让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。《论语》中“让”字凡七见，既是一种谦逊态度或处世准则，如“夫子温良恭俭让”“当仁不让于师”等；又是一种政治理想，如孔子云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！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”中国是礼仪之邦，“辞让之心礼之端也”“无辞让之心非人也”“让者，礼之主也”。“孔融让梨”“尧舜禅让”“退避三舍”等，成为一种备受推崇的做人境界，体现出了谦谦君子的风度。事实上，我们有很多官员在个人得失上、名利上，让名誉、让福利、让待遇、让奖励，让出了风格，让出了境界。很多人在出行、乘车、购物等生活细节中，也发扬礼让精神，促进了社会和谐。那些在生活中不懂礼让的人，真该到“仁义胡同”“六尺巷”去走一走，净化心灵，或能品味出“礼让”的高尚和甘美来。